

## 第八章 出土文物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

### 第四节 非贸易品

非贸易品是指贸易对象之间不作交换的商品，多为随身携带作日用之用，以遗弃、赠与等形式，留落在异域的出土器物。比如前文所述马来半岛发现的汉代陶器残片、印章以及阿里卡梅杜遗址出土的一些中国陶瓷器。这些在沿线发现的汉代器物，仅是零星出土，应非当时的贸易商品。

合浦输入的非贸易品有波斯陶壶和铜钹，均为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汉代遗物，应是随身携带进入的日用品。之前，已作初步探讨<sup>[1]</sup>。这两件器物，均出自寮尾 M13b。M13 为同坟异穴合葬墓，发掘前封土堆残高 1.6 米，直径约 47 米。其两穴基本呈平行排列，相距 3.5 米，中间以生土隔墙。就构筑材料而言，M13b 属砖木合构墓，或称“砖圹墓”，四壁及底部铺砖，顶部以木料盖覆。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，总长 21.86 米，其中墓道长 14.76 米，宽 1.8 米；墓室长 7.1 米，宽 4.25 米。该墓在历史上曾遭严重盗扰，盗洞直达墓室底部，残存器物集中于墓室后端未被扰及的一角，从盗洞延伸痕迹和出土器物来看，此位置未被扰及。该墓墓室及墓道开口周围有基本对称的柱洞 30 个，应为筑墓时临时建筑的遗存，墓道填土经层层夯筑，墓砖火候高，结砌工整，地砖侧铺成厚实整齐的“人字形”。这些讲究的做法，在厚葬之风衰落的当地东汉晚期墓中，还是比较罕见的。

#### 一、波斯陶壶

陶壶为青绿釉，属低温釉陶。陶胎黄白色，火候较低，其表面光滑，有细密开片。器内亦施一薄层青色釉，手工拉坯留下的粗条指压旋痕可见。壶小口外侈，圆唇，带“V”形短流。颈细长，腹部椭圆，矮圈足。壶的颈腹间附曲形手柄，柄上有二道凸棱，肩部饰二周宽带纹。壶口径 8.2 厘米，足径 10.8 厘米，最大腹径 19.2 厘米，高 34.4 厘米(图 8-19:1)。

这是一件典型的帕提亚时期的釉陶壶，口沿有棱且呈水平方向外撇，长颈鼓腹，肩部带单把手、有圈足，在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等，均有收藏。学术界普遍认为，这类陶器制作于今伊拉克南部或伊朗南部。寮尾陶壶与幼发拉底河畔的塞琉西亚遗址所出土(图 8-19:2)<sup>[2]</sup>，我们习惯统称为“波斯陶”的，无论外形、做工，还是釉色，都极其相似。测试结果显示，寮尾陶壶釉面的化学成分组成与我国古代多种陶瓷无一相同或相近，是完全不同的体系。烧成温度较汉代绿釉陶低，吸水率则较汉代绿釉陶高，陶片釉面中的微量元素里几乎不含铅，釉面的助熔剂为氧化钠，而汉代绿釉陶器釉面的助熔剂则一般为氧化铅。与寮尾陶壶形制最接近的塞琉西亚遗址标本，基本出自第 1 层与第 2 层，其年代范围在公元 43-200 年之间，而寮尾 M13 恰好处于这一范围的后段。

合浦和西亚之间的海路沿线，这类陶器也有较多发现。印度西南部卡拉拉邦的 Pattanam 港口遗址(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)，早期地层出土较多这类陶壶的残片。

这个港口，被认为是传说中通往罗马的香料之路的穆吉里斯港(Muziris)<sup>[3]</sup>；斯里兰卡的迪萨马哈拉玛克(Tissamaharama)遗址，出土了许多公元2世纪从两河流域通过印度洋贸易来到当地的波斯陶，其中不乏与类似合浦的青绿釉低温陶<sup>[4]</sup>；拉地峡西岸的Phu Khao Thong遗址，也有类似陶片出土<sup>[5]</sup>。这些发现，为我们复原了波斯陶自西而东的大体传播线路以及北部湾地区、东南亚、南亚与西亚共同构成的庞大的中西贸易网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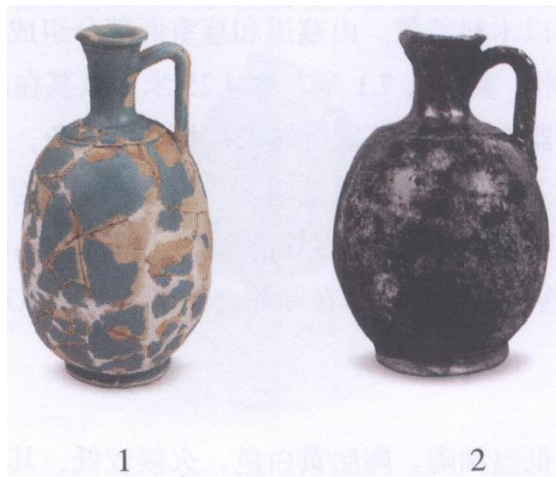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8-19 出土波斯陶壶

1. 合浦寮尾 M13b 2. 伊拉克塞琉西亚遗址

寮尾出土的陶壶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同类器物，弥足珍贵，它对于研究波斯陶的输入年代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重大。此前发现的波斯陶，年代晚至隋唐和五代，完整器物有1965年在扬州城南汽车修配厂出土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双耳壶等<sup>[6]</sup>。广西出的桂林和容县十个地点也有唐代残片出土，这些陶器的肩部较薄，愈往腹下部愈厚。胎呈浅淡米黄色，质地细软致密，吸水性强，故内外均施满釉。外釉呈孔雀蓝色，个别残片微泛绿，均有细开片；内釉颜色较淡，呈湖水蓝色<sup>[7]</sup>。从造型和制作工艺来看，与寮尾 M13b 所出，无疑是一脉相承。

## 二、铜铍

这件器物最初泛称为“铜圆形器”，出土时对应的两边因枕木沟挤压，变形翘起，但基本完整，且纹饰大部清晰可鉴。器物直径18.6厘米，厚0.2厘米。正面平无纹饰，背部镌刻密集精细的花纹。背面中部为内空的半球形隆突，上饰双线柿蒂纹，里侧还有一组互不相接的小柿蒂纹，中心是圆圈纹。隆突的底部对称的四个穿孔，其中两孔近圆形，两孔近方形。隆突之外，饰大的双线柿蒂纹，蒂内以束腰菱格纹为中心，两侧饰对称涡形云气纹、复线菱格纹和带羽翼状尾的“S”形云气纹。双线柿蒂纹之间，可分为四区：一区饰一龙；相邻的一区是双龙缠绕相对，龙上面蹲着一只蟾蜍，蟾蜍前爪各牵一根龙须，其余两区是羽人驭龙的纹样。羽人为人首鸟身，头插羽毛，肩生羽翼，裸身，身体瘦小，单足。龙张口，有须、角和耳，背部见鳞，出羽翼，四足作奔走状（图8-20）。

器物的定名颇费周章。我们查阅了大量的中外文献，并请教了多位熟悉南亚、东南亚考古的国内外学者，均未获得类似的实物资料。国内出土的圆片状青铜器中，云南江川李家山西汉墓见数量较多的“圆形铜扣饰”和“圆片形铜器”<sup>[8]</sup>，但扣饰背部都有矩形齿扣，圆片形器多正面内凹呈浅盘状，中部开圆孔或背面有实心钮，大小、外形则与这件“铜圆形器”相去甚远。其余作为佩饰、镶嵌之用的器物，经仔细比对之后，均被一一排除。最终我们注意到，“铜圆形器”很可能是一件乐器，其背面的半球形隆突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，似钹上的“突”，和面径的比例约五分之一，接近陕西蓝田发现的钹较<sup>[9]</sup>。但钹通常成对使用，而从发掘现场判断，基本排除了入葬一副两片的可能，且钹单体呈圆盘形，而这件器物面平，没有共鸣腔。隆突的穿孔形式也有所不同，钹一般是在隆突中心钻一小孔以拴系绸布，而该器是在隆突底部等布四孔。此外，“铜圆形器”背部花纹繁缛，所见后代的铜钹则为素身。不过，周菁葆提及一类铜钹，为单片，以棒槌击奏<sup>[10]</sup>。尽管其依据不详，也无实物可供借鉴，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。这件“铜圆形器”具备钹的“突”，穿孔可拴系钹带，面平可击奏等特征，花纹中羽人等题材也与钹作为法器在一定程度上契合。因此，我们初步判断它是一种乐器，为单片形式的钹。



图 8-20 寮尾 M13b 出土铜钹

日本学者林谦三在 1962 年出版的《东亚乐器考》提及，钹源于西亚，较早在埃及、叙利亚出现，以后在波斯、罗马等地流传。在东方，先见于印度，而后中亚<sup>[11]</sup>。至于铜钹传入中国的时间，则最晚为北朝时期，通过陆路从印度传入甘肃武威一带，《隋书·音乐志》曰：“天竺者，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，重四译来贡男伎，天竺即其乐焉。……乐器有……铜钹、贝等九种，为一部。”<sup>[12]</sup>铜钹的考古发现，早于文献记载的时间，是作为人俑的附着塑像出现。20 世纪 50 年代，云南晋宁石寨山发掘的西汉中期墓 M13 出土一件鎏金铜饰物，报告称为“双人舞盘铜饰物”<sup>[13]</sup>。随后，汪宁生指出舞人高鼻深目，疑来源于西方，



考证其手持之物非盘而是钹<sup>[14]</sup>。1955年西安十里铺东汉墓出土一件有翼小铜人，高仅3.2厘米。其两肋生翼，颈带珠圈，微曲小腿，手拿小钹合于胸前<sup>[15]</sup>。李淞推测这件小铜人为希腊神话的爱神厄洛斯，应是来自希腊化的中亚或附近地区<sup>[16]</sup>。察尾墓地发现的单片铜钹，国内没有发现，中亚和西亚早期所见器物亦无与之相类，因此，我们只能从器物装饰纹饰入手，力图说明其来源。

铜钹的纹饰为岭南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常见的镌刻花纹，由柿蒂纹、羽人、翼龙、蟾蜍等组成，与国内出土的汉代青铜器或画像石、画像砖中的纹饰颇为相似，但其单体纹饰及组合方式，区别仍比较明显，溯其源头，多与域外文化因素有关。柿蒂纹常见于合浦汉墓出土的铜三足盘、盒、扁壶、樽等镌刻花纹器物 and 铜镜上，多位于中心或钮座，比较小。铜钹所见柿蒂纹则不同，有内外大小两组，且柿蒂内卷云纹下端还有羽翼状纹饰。柿蒂纹多被以往学者认为是中国传统纹饰，但事实上，其脱胎于公元前1000年伊朗鲁利斯坦铜器的莲花、石榴相间纹，进入中国后，在西部地区率先流行，甚至外圈的复线菱格纹，也是源于波斯王室喜爱的标志<sup>[17]</sup>；所饰的五条翼龙，在国内发现众多的汉代龙纹中，仅与辽宁金县营城子东汉墓M2<sup>[18]</sup>中壁画所饰龙纹较为一致，其余则多不相同。这种翼龙可以在古代迦勒底文化中找到亲缘关系，迦勒底的龙，有四足，身上有鳞，且有双翼<sup>[19]</sup>；两个羽人，均作骑龙状，与石寨山M1出土铜鼓上的羽人相似，形体较小，人首兽身，身生羽翼。报告中提及越南出土的数面鼓中，也有此种羽人<sup>[20]</sup>。羽人亦称飞仙，是汉代艺术中常见的人物形象。汉代的羽人形象所隐寓的文化极为复杂和多元化，但明显透露出中西亚有翼神兽的痕迹<sup>[21]</sup>。至于纹饰中的蟾蜍，在汉代的画像艺术中，通常是作为西王母仙境的组成部分<sup>[22]</sup>。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与现今中亚地区接壤，位于今新疆西南，包括喀喇昆仑山和阿里高原<sup>[23]</sup>。

为进一步揭示铜钹所隐藏的历史信息，探讨其来源，我们选取同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铜熏炉与之进行成分比对测试<sup>[24]</sup>。测试结果，如下表所示。

检测结果中的硅(Si)、钙(Ca)应源自埋藏环境的土壤，而含有平均值为1.23 wt.%的砷(As)，可能来源于铜矿或铅、锡料中的共生成分。熏炉的成分分析中未检出砷(As)，说明不含砷或砷含量低于能谱检测下限。两件器物中砷含量的差异，说明两者所使用的青铜原料可能不同。尽管不能明示矿料的来源，但砷铜的出现本身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。砷铜于公元前第四千纪初在西亚出现，随后得到广泛使用，至公元前第三千纪年，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很多地方，砷铜的使用已占据主导地位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到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叶，欧亚草原中部的乌拉尔山一带已形成砷铜生产和使用的中心，并有砷铜向东传播的迹象<sup>[25]</sup>。中国古代的砷铜集中发现于西北的甘肃和新疆等地，内蒙古、北京、河南和青海也有零星出现<sup>[26]</sup>。此前，合浦也曾检测到了砷铜，东汉早期的九只岭M5出土一颗金箔包裹青铜珠，推测是通过印度传入的西亚器物，其砷的含量平均达3.96 wt.%<sup>[27]</sup>。砷铜

集中出现于陆上丝绸之路沿线西北地区，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合浦稍晚也有发现，或与古代西方砷铜的传播相关，这也为探讨铜钹的来源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铜熏炉和铜钹成分测试结果 (wt. %)

器物	位次	成分						
		氧 O	硅 Si	锡 Sn	钙 Ca	铜 Cu	砷 As	铅 Pb
铜熏炉	面扫 1	14.30	0.00	16.91	0.44	55.94	0.00	12.41
	面扫 2	12.79	0.00	15.30	0.39	61.85	0.00	9.67
	平均	13.545	0.00	16.105	0.415	58.895	0.00	11.04
铜钹	面扫 1	18.10	0.82	21.02	0.73	49.24	0.32	9.77
	面扫 2	20.18	0.77	21.76	0.63	49.69	1.32	5.65
	面扫 3	31.62	1.35	28.51	0.76	30.71	1.85	5.20
	面扫 4	24.18	1.15	24.19	0.70	41.71	1.62	6.45
	面扫 5	28.78	1.95	26.01	0.86	32.72	1.06	8.62
	平均	24.57	1.21	24.30	0.74	40.81	1.23	7.14

这件铜钹无论是纹饰，还是成分分析，都赋予了强烈的域外文化色彩。它的出现，实非偶然，该墓还随葬了前述的波斯陶壶和玛瑙串饰等。而唐杜佑《通典》说铜钹“出西戎及南蛮”<sup>[28]</sup>，也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提示：除西来外，南方也是铜钹的另一个源头。因此，我们认为这件铜钹与波斯陶壶来源一致，也是从西亚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辗转输入的。如推测无误，它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实物资料<sup>[29]</sup>，对于研究古代乐器史和中西文化交流，意义非同寻常。

[1] 黄珊、熊昭明、赵春燕：《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出土青绿釉陶壶研究》，《考古》2013年第8期；熊昭明：《广西合浦汉墓出土铜钹略考》，《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》，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327-331页。

[2] Neilson C. Debevoise, 1934. Parthian Pottery from Seleucia on the Tigris: 26.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tudies. Series 32. Ann Arbor: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.

[3] P. J. Cherian & Jaya Menon, 2014. Unearthing Pattanam.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Museum, New

Delhi, India. P56-57.

[4] Schenk, H. 2007. Parthian Glazed Pottery from Sri Lanka and the Indian Ocean trade. *Zeitschrift für Archäologie Außereuropäischer Kulturen* 2. pp. 57-90.

[5] B. Bellina, 2014. The Developmem of coastal polities in the upper Thai-Malay Peninsula. In book: *Before Siam was born: new Insights on the art and Archaeology of Pre-Modern Thailand and its Neighbouring Regions*. Publisher: River Books, Edited by N. Revire & S. Murphy, pp. 69-89.

[6] 同长源:《扬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》,《考古》1985年第2期;顾凤:《扬州出土波斯陶及其在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》,《东南文化》1988年第1期;汪勃:《再谈中国出土唐代中晚期至五代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》,《考古》2012年第3期。

[7] 李铎、封绍柱、周华:《广西出土的波斯陶及其相关问题探讨》,《文物》2003年第11期。

[8]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:《江川李家山——第二次发掘报告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7年,第98-101、154-155页。

[9] 西北大学在蓝田县征集了两副北宋铄钹,其上面的点凿文字内容纠正了《辞海》等关于“铄”、“钹”定义的解释。按照《辞海》解释,铄的“突”小,其“突”的直径约占全径的1/5;钹的“突”大,其“突”直径约占全径的1/2。但根据此发现,“突”的大小和其所占全径的比例正好与辞书解释相反。参见贾麦明:《北宋宣和三年铜铄及相关问题》,台湾《汉学研究》1996年3期。

[10] 周菁葆:《丝绸之路上的铜钹》,《乐器》2012年第2期。

[11] 林谦三:《东亚乐器史》,北京:人民音乐出版社,1962年,第27页。

[12] (唐)魏征:《隋书·音乐下》卷十五,北京:中华书局,1973年,第379页。

[13] 云南省博物馆:《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59年,第81-82页。

[14] 汪宁生:《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》,《考古学报》1979年第4期。

[15] 雒忠和:《西安十里铺东汉墓清理简报》,《考古通讯》1957年4期。

[16] 李淞:《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》,长沙:湖南教育出版社,2000年,第306页。

[17] 沈福伟:《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8年,第69-77页。

[18] 贺西林:《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》,《文物》2010年第7期。

[19] 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(30卷本)第3卷第652页。转引自沈福伟:《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》第81页。

[20] 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:《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》,《考古学报》1956年第1期。

[21] 杨孝鸿:《汉代羽化形象的发展及其原因》,《南都学坛(人文社会科学学报)》2004年第2期。

[22] 张勋燎、白彬:《中国道教考古》第3册,北京:线装书局,2006年,第795页。

[23] 周运中:《〈山海经〉昆仑山位置新考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第23卷第2辑,2008年4月。

[24] 样品测试单位为广西大学材料学院,所用仪器为美国EDAX公司生产的能谱仪。

[25] 梅建军、刘国瑞、常喜恩:《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》,《西域研究》2002年第2期。

[26] 潜伟、孙淑云、韩汝玢:《古代砮铜研究综述》,《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》2000年第211

[27] 熊昭明、李青会:《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11年,第168-170页。

[28] (唐)杜佑:《通典·乐四》卷一百四十四,北京:中华书局,1988年,第3673-3674页。

[29] 我国发表古代铜钹的实物资料不多,较早的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副半铜钹,出土地点不详,年代为唐(何林:《唐代铜钹》,《紫禁城》1988年第6期)。稍晚的有“‘宣和三年(1121年)’款铜钹”,一为西北大学在蓝田县征集,另一出自徐州雪山寺窖藏(李银德:《徐州雪山寺北宋窖藏纪年文物》,《文物》1993年第3期)。再晚的还有辽宁瓦房店市后台村窖藏出土6件金代铜钹(赵云积、刘俊勇:《辽宁瓦房店市后台村金代铜钹窖藏及有关问题》,《北方文物》2000年第3期);大连谭家屯窖藏出土2副金代铜钹(刘俊勇:《大连谭家屯金代窖藏》,《文物资料丛刊》8)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83年)。